

46

毛泽东散文作品赏析

MAO ZEDONG SAN WEN ZUO PIN SHANG XI

海南出版社

智 慧 的 宝 库 力 量 的 源 泉

Selected Readings of Mao Ze Dong's prose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

毛泽东散文作品赏析

著作:任敖霜 责任编辑:万 胜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丽源印刷厂印刷

199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98年11月第2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张:14

字数:350千 印数:10000~15000册

ISBN7-80617-904-6/A·3 定价:23.00元

前言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毛泽东已逝世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早已愈来愈广泛深入。但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仍有一片研究的处女地空在那儿,那就是从散文学的角度进入毛泽东。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还无任何人从这方面去加以考察。然而毛泽东作为一位曾全面深刻地影响过(包括他身前与身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散文学家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

两年前,我偶然翻阅过一本德文版的世界现代诗选,其中中国诗人只选了毛泽东一人。他的诗歌排在聂鲁达之后,西尔维亚·普拉斯之前。而这两位诗人都是具有革命意识的先锋诗人。我不得不叹佩编选者独到的目光。的确,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形像早已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熟悉。但作为一位伟大散文家的形像,在今天的中国却有点被人们忽略了。但在国外,他散文的影响力一直很大,60年代,他的散文曾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过一个竞相学习的高潮;在美国,尤其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中,毛泽东散文的号召力可谓傲视群雄、深入革命青年的灵魂。从此,毛泽东散文的影响力一直稳步前进、持续不衰。而且在国外研究毛泽东的散文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一年前,我读过一本美国女学者(她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是一

位致力于后现代研究的专家,当然也是一位极力推崇“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毛主义者)写的书,此书是专门研究“话语权力”的,她认为毛泽东是“话语权力”的始作俑者。同时她指出毛泽东早在1942年《反对党八股》中就为“话语权力”作过最准确的解释。什么是“话语权力”?毛泽东已在此文中告诉了我们:“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从这一意义上说,《反对党八股》是关于“话语权力”的经典著作,是优秀的文艺批评。

这位女学者的见解使我对毛泽东散文的认识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同时也倍觉汗颜,我及我们这一代人竟然对毛泽东的认识,尤其是散文学方面的认识会如此肤浅。但很快又产生了一个动力,在羞愧中,我开始了工作,尽管这项工作仅仅是万里长征开始的第一步,即着手编选一本《毛泽东散文作品集》。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即是首次珍重而系统地确立毛泽东的散文大师的形象。

我们知道,中国散文广义地说可以分为古代散文与现代散文。现代散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话文。而散文是衡量一个民族语言水平、思想水平的标准。不妨打一个比喻,田径是一切体育运动的基础,一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之高低,仅从这个国家的田径运动水平就可以看出来。田径水平高,这个国家的整体运动水平就高。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散文水平高,它的整个文学水平就高。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的基础。

这里,我不谈古代散文的丰功伟绩。让我们十分简略地来看一下白话散文的情况。

五四以来,中国白话散文经历了两个重要时期,代表了中国散文的新水准。第一个时期是以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等为代表,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景象和整体实力,真可谓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那个时代散文的形式,我们撇开时代背景不谈,单就形式上的借鉴来说,来

源于两个部分：一是明末散文的独抒性灵，不拘一格；二是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散文。这两者的溶合（即毛泽东后来指出并提倡过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中国散文得以突破，终于一枝独秀于文坛。“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毛泽东语，见《论作诗——致陈毅》）。不仅毛泽东，连胡适也持这种观点。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中，散文革命是成功的，而新诗却无什么突破（虽然胡适本人曾经首倡过新诗运动）。中国现代散文终于在这批二、三十年代的人文手中完成了从古汉语到白话汉语的过渡，这次书面革命带来了文体上的各式花色品种，总之是一次大进步。

然而，中国散文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决定中国散文发展方向的时期，是毛泽东散文体的出现，它标志着毛泽东文体的准社会化及影响。大体上可以说是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完全形成定式。它波及到各个领域，并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道德行为及语言表达习惯（有关毛文体的影响力我还将下面细谈，在此暂且打住）。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看毛泽东散文体的形成之历史吧。

毛泽东从1912年6月写第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到1956年9月1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其文章可分为六个时期。在这六个时期中，他文章的根本（即民族性、思想性、艺术性）没有变，而文风却有变化。

在毛泽东散文作品的第一个时期，即早年作品时期，他的文风骏爽入古，笔力俊逸挺拔，具有英雄创世的豪气。

这一时期，毛泽东十分推崇“康梁笔法”，而其中尤其推崇梁启超的“野狐”笔法。梁文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毛泽东正是这种文风的仿效者。毛泽东写文章一贯感情充沛，这一特征非常鲜明、令人瞩目。除此之外，他在这一时期还研习过韩愈的文章，读过大量古文，以他自己的话说：“我熟读经书”，也推崇过孔子。因此，毛

泽东的文章一直具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

很快,他就从康梁(还包括部分韩愈)的影响下脱了出来,进入了他的第二个时期,即建党和大革命作品时期。这时他的散文开始出现自己的声音了,行文已是一律的白话文,笔法恣意纵横、势如破竹,起到了革命先锋的作用,而且他的思想也出现了飞跃。因在此之前,他的思想仍是漂浮不定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而这时,已彻底不同了,他已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这一身份必然使他的文风发生质的变化。他开始注意使自己的文风能够准确地为无产阶级所理解、所接受。他也开始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或导师身份说话。从此,他文章的影响面与覆盖面更加广阔了。

1928年至1937年,是毛泽东散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即土地革命战争作品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的散文多与战争与军事有关。但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是一位文治武功都不偏废的作家,所以他除写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散文以外,也写下了他的旷世哲学名篇《实践论》、《矛盾论》以及他后来一直十分欢喜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1937年至1945年,毛泽东的散文进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即第四个时期),抗日战争作品时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相比之下,没有前一个时期那么紧张,他多少能够腾出更多时间来进行更广阔的思考了。同时,他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最高实际领导人。这一领袖身份本身就已经使他的散文具有了伟大的号召力。我们在此撇开他的领袖身份不谈,单就他这一时期的散文而论,的确是完全成熟了,独创性比比皆是,随处可寻。他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

文学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力。

《反对党八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这些篇什，堪称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第一次为我们统一了新社会的口径、约定了口气和表达感情的方式。从此，新一代的人民用起来极为方便，报纸、电影和讲话、甚至恋爱都采用了这种语法和修辞。

毛泽东不仅通过他的散文，还通过报纸、杂志、政治学习、思想总结等辅助手段，建立了一整套十分完美的学习制度。在这个学习制度里，毛话语得到了普及和提高。比如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进入了毛话语体系，即毛泽东散文语体。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毛文体有一个优势——他的话语从根本上是一种现代性话语——一种和西方话语有密切关系，却被深刻地中国化了的的中国现代性话语。”（李陀语）不仅是中国文人受其影响，据说爱走偏锋的法国怪才福科晚年也被毛话语（即：毛泽东散文）所吸引。

毛泽东本人很清楚，为了转变意识形态必须改变语言和写作，语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这一思想他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至今我还记得我的一位学音乐学的朋友付显舟对我说过的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話。一次他谈到毛文体对他的影响力时说道：“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就是毛文体所规定的那一套语系。我最初想尝试经过汉语翻译的西方现代散文语言或五四时期的语言，但文章就写不动了，语言也不灵了，还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我明显感到毛文体的强大，用毛泽东散文体写文章就是得心应手，非常方便。”

毛泽东的散文在这一时期的确是硕果累累、妙文迭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这一著名的文艺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也可以找到它的代表,白居易就曾在繁荣的唐朝提倡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据说,他有一次写了一首诗,读给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婆(无疑是劳动妇女)听,他边读边改,一直改到老太婆听懂时为止。这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古代事例很多,在此不赘。

1945年至1949年,是毛泽东散文的第五个时期,即解放战争作品时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围绕着“破”与“立”这两个大主题。埋葬蒋家王朝的历史任务(也就是“破”)即将完成了,那么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呢?毛泽东写出了一篇万分重要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此文回答了“立”的问题,即如何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发出过震撼世界的名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引自本书《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一文)历史将随同毛泽东的散文一道翻开它崭新的一页。

1949年至1956年,毛泽东的散文进入他的第六个时期,即建国以后的作品时期。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散文风格,我们可以用他自己曾说过的一句非常富有诗意的话来概括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面对“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新中国,毛泽东慨当以慷,的确写出了“更新更美的文字”,即写出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更新更美的散文。

平心而论,自五四以来,真正影响过中国文学进程的只有两个人,一是鲁迅、二是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他说,中国只有两个圣人,一是孔子,二就是鲁迅。他还说他的内心是与鲁迅相通的。两位中国大文学家的内心的确是息息相通的。

然而鲁迅作为中国文豪的地位早已成了定论。但是毛泽东

呢？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他除了是一位伟大诗人之外，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中国大文豪。

1996 年 11 月，第二稿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1)
-----------	-----

一、早年作品	(1)
商鞅徙木立信论	(3)
体育之研究	(6)
给黎锦熙的信	(16)
夜学招学广告	(23)
论豪杰	(26)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29)
民众的大联合(一)	(34)
民众的大联合(二)	(37)
民众的大联合(三)	(42)
原来是他	(49)
祭母文	(50)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53)
赵女士的人格问题	(56)
发起文化书社	(59)

二、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作品赏析	(61)
-----------------------	------

致蔡和森等的信	(63)
外力、军阀与革命	(72)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76)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83)
“糟得很”和“好得很”	(87)
所谓“过分”的问题	(89)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作品赏析	(93)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95)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98)
给林彪的信	(100)
反对本本主义	(112)
长 征	(122)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25)
给蒋介石的信	(128)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132)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138)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141)
祭黄帝陵文	(143)
实践论	(145)
两种宇宙观	(160)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	(167)
反对自由主义	(169)
给雷经天的信	(173)
论鲁迅	(176)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	(180)

五四运动	(187)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0)
纪念白求恩	(203)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206)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209)
吴玉章寿辰祝词	(213)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216)
《农村调查》的序言	(218)
改造我们的学习	(222)
整顿党的作风	(231)
反对党八股	(248)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65)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294)
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298)
为人民服务	(301)
愚公移山	(304)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	(309)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311)
三个月总结	(323)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328)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332)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337)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342)
将革命进行到底	(345)
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354)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356)

论人民民主专政	(360)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373)
别了，司徒雷登	(380)
“友谊”，还是侵略？	(387)
唯心历史观的在破产	(391)
六、建国以后的作品	(401)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403)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408)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410)
给黄炎培的信	(416)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	(420)
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426)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428)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	(431)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436)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	(440)
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442)
中国和外国关系	(444)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450)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459)
后 记	(464)

一、早年作品

商鞅徙木立信论

(一九一二年六月)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尽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尽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拏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

捧腹而笑，噉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赏析〕

毛泽东写出这篇散文时，年仅19岁，那时他正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

这是一篇极具眼光、立论精当的文章。当时的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颉颃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另有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以上这些评语是对该文最确切的品评。

为什么说毛泽东的此文风格“恰似报笔”呢？

我们知道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特别热爱读报，其中尤其喜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因此，毛泽东的文风在当时颇受康梁的影响，文笔显得平易畅达，反对桐城派古风，追求经世致用的特点。而且毛泽东极其推崇梁启超的“野狐”笔法，“其文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则别有一种魔力。”毛泽东正好是这种文风的仿效者。他还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校长李元圃就曾当众表扬他的文章深得康梁笔意，号召其他同学向他学习。

然而，对于毛泽东的这种梁启超笔法，也有些国文教员不以为然。他曾对斯诺说过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一则故事：“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